

鲍春柏张宝林 主编

拒绝遗忘

北京老五届
在插花庙的岁月

海天出版社（中国·深圳）

杯主编

拒绝遗忘

北京老五届
在插花庙的岁月



海天出版社（中国·深圳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拒绝遗忘：北京老五届在插花庙的岁月 / 鲍寿柏，
张宝林主编. —深圳：海天出版社，2015.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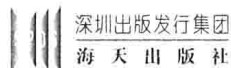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507-1287-4

I. ①拒… II. ①鲍… ②张… III. ①回忆录—作品
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23911号

拒绝遗忘：北京老五届在插花庙的岁月

JUJUE YIWANG: BEIJING LAOWUJIE ZAI CHAHUAMIAO DE SUYUE



出品人 陈新亮
策划编辑 于志斌
责任编辑 孙 艳
责任技编 蔡梅琴
封面设计 王 璇

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

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(518033)

网 址 www.htph.com.cn

订购电话 0755-83460137(批发) 83460397(邮购)

设计制作 深圳市龙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(0755-83461000)

印 刷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 20.5

字 数 280千

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

印 次 2015年3月第1次

定 价 48.0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《拒绝遗忘：北京老五届在插花庙的岁月》

编委会

主 编：

鲍寿柏（北京大学）

张宝林（中国人民大学）

编 委：

朱听如（北京大学）

张宝林（中国人民大学）

徐振源（北京大学）

高 峰（北京大学）

傅耀良（清华大学）

鲍寿柏（北京大学）

序言

“特种兵”的晚岁思考

◎张宝林

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已经 30 多年了，“文革”研究在世界上已经成为一门显学。关于它的起源、沿革、核心人物、历史事件、悬疑、影响，以及经验教训，世界上早有许多学者从政治学、经济学、历史学、文化学，甚至民族学、人类学、心理学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，并取得了丰硕成果，但十分遗憾的是，目前世界上“文革”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机构并不在中国本土。在我们这片国土上，“文革”研究尽管已不再是空白，但似乎并未完全解禁。这块全民族的心病，依然折磨着我们的灵魂。

其实，早在“文革”结束后的第五年，即 1981 年，中国共产党就在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中，用五分之一的篇幅论及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其主要结论是：

“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‘文化大革命’，使党、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。这场‘文化大革命’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。

“‘文化大革命’的历史，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‘文化大革命’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，也不符合中国实际。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，是完全错误的。

“实践证明，‘文化大革命’，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。它根本不是‘乱了敌人’而只是乱了自己，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‘天下大乱’达到‘天下大治’。……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，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、破坏和倒退。历史已经判明，‘文化大革命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，被反革命集团利用，给党、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。”

这场“给党、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”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“文革”虽然早已结束了，但它的“遗毒”还在，正像一个病灶未除的巨大疽痈，虽然表面已经平复，终究还是隐患。现在有一些人怀念“文革”，竟把解决当前社会尖锐矛盾的法宝押在第二次“文化大革命”上。这难道还不值得警惕吗？这些年，国内出版的党史、军史、国史汗牛充栋，但是，迄今为止，我们还没有见到一部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、专门论述“文革”教训的专著，就连反映“文革”的小说、电影、戏剧，也寥若晨星，屈指可数，仅有的那一二十部，也大多是早些年的作品。

对于“文革”的深度反思，绝不仅仅是政治家、史学家、理论工作者们应做的事，也是每一个公民应做的事，对于亲身经历过“文革”全过程的人来说，尤其负有一份神圣的责任。我们相信这种全民族痛苦而真诚的反思和自省，大大有利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救赎和国家振兴。

我们这群“文革”中期毕业于北京八大院校，后来被命运抛到安徽一个叫插花庙农场的400多名大学生，正是被裹挟着参与了“文革”全过程的人，而且在一段时间里，我们还处在“文革”的“风暴眼”中。我们有过认真反省和重新检视那段历史的冲动和思考，但我们缺少一个契机，一个由头，现在，这个契机和由头来了。

我们这个群体是1970年形成的，那一年的初春，北京大学250多名63、64、65级学生，清华大学30多名64、65级学生，从蚌埠火车站集体列队，向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独立一师的阜阳插花庙6377部队农场进发。8月，包括笔者在内的中国人民大学、北京政法学院、北京广播学院、北京体育学院、中央财经学院、北京语言学院等6所大学的100多名毕业生，也陆续加入这支队伍。这批当年被贱称为“臭老九”的“旧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”，组成了一支特殊的6377部队学生营，既是被迫又是自觉地进行着艰苦的磨炼和改造，先来的一年，后来的一年半，然后再分配到全省各地工作，开始他们踏入社会的长征。

自此之后，我们与以下关键词——插花庙，学生营，81、82、84分队，融汇成了一支特殊环境下的“特种部队”，我们便是这支“特种部队”的一批非工、非农、非兵、非学的“特种兵”。通过我们这些活生生的标本，世人或许可以触摸到当年一个持续发烧40度、病情延续10年之久的庞大病躯的脉搏，从而做出恰当的病症分析和病因判断。

2010年，我们这些“特种兵”的部分战友40年后相聚合肥，几位同学不约而同地提出编辑一本回忆文集的设想。这个倡议立即得到更多战友的赞同。

回忆文章怎么写？

大家的共识是，应主要记述自己在部队农场“接受再教育”时亲历的事实，越具体越好，越准确越好，细节越多越好。“文革”悲剧必须正

视，各种荒诞和丑陋都必须记录在案。知耻近乎勇！承认事实，是反思、批判和彻底与罪恶诀别的前提条件。历史是全民记忆，在正襟危坐、冠冕堂皇的官修正史之外，应有大量的、细碎的、鲜活的民间稗抄予以补充。

聚会结束后，几位热心的战友接受大家的委托，很快就建起一个工作班子，向各地战友寄发了“征稿函”，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。

战友们踊跃参与的热情是出乎预料的。短短几个月，筹备组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篇文章。这些文稿，主要写我们在农场一年多的共同经历、遭遇和感受，有的长篇大论，写了农场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有的短小精悍，写了自己对往事的点滴回忆；有的以写事为主，有的以写人为主；多数是记叙文，也有诗、词、日记等体裁。尽管文风各异，感受有别，甚至还有一些不同观点，但都是大家的倾心之作、肺腑之言，说的都是真人真事和真情实感，字里行间，跳动着—一个“真”字。

夜深人静，披览这些浸润着青春激情与乱世感触的文字，在农场经历过的那一幕幕场景，又都浮现在我的眼前。我仿佛穿越时间的隧道，回到了那片曾经洒满我们的汗水和泪水，我们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的土地。我预感，这将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。它像一幅工笔长卷，为世人提供了“文革”中期许多具体而微的历史细节，描摹了一片丰富多彩的时空背景，在那沉甸甸的叙述后面，我也看到了一粒粒闪烁着耀眼光芒的理性思维的结晶。

这本书可作为文学作品赏读，也可当作文史资料研究，更可看作是一个特殊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自画像和心灵史。还有一点并非不重要，这些年，老干部、老知识分子、下乡知青、中学老三届红卫兵等各界人士的“文革”遭际，都曾有人写过回忆文章或文艺作品，有的还拍成了影视作品，唯独对“老五届”（61级至65级）大学生很少有人写，这段历史的断层，这个历史的遗憾理应由我们自己来弥补。

正如一千六百万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，是“文革”期间解决“失

业”问题的权宜之计一样，连续三届二三十万大学（不含大专）毕业生，在1970年春夏，集中发配到农村、厂矿、边远基层、部队农场“接受再教育”，其实也是正常社会秩序被彻底颠覆后，缓冲就业难题的无奈之举。

据北大、清华的同学回忆，这几届大学生的分配方案，是由国家计委负责制定的，原本先后出台了两个方案，但都被“四人帮”及其爪牙否定，最后的方案是“四个面向”：面向农村，面向工厂，面向基层，面向边疆。国家和家庭花了巨大代价培养出的青年学子，被投闲置散，多年学成的专业知识根本没有用武之地。

“6377 特种部队”的短暂历史，印记着“文革”的荒诞与迷失。“6377 特种兵”这一滴水，映照着那个怪诞时代的诡异风云。

“文革”是从北大聂元梓的“第一张大字报”开始的，北大、清华是“文革”试点“六厂二校”中的那两所名校。曾几何时，“文革”中受到伟大领袖八次接见的两校和其他高校的大批“红卫兵”，则被发配到农村、农场劳动改造。从“革命小将”到“臭老九”，原来不过一步之遥，正像多少开国元勋一夜之间就成了“牛鬼蛇神”。

当时中央的理论权威“两报一刊”社论反复告诫人们，“文革”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，人人都要过这一关。“走资派”触及灵魂，必须戴高帽游街、坐“喷气式”挨斗、关“牛棚”劳改；知识分子触及灵魂，必须放下书本、笔杆、仪器，到干校种地、耕田，到厂矿当清洁员、锅炉工；大学生触及灵魂，就必须到基层，接受超出精神和体力极限的劳动锻炼，以脱胎换骨成为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”的新人。

人们不会忘记那些政治铺张和形式作秀，红海洋的铺天盖地，“三忠于，四无限”的唱诵无边，“天天读”“忠字舞”的愚钝疯狂；不会忘记明火执仗的谋杀，莫须有的诬陷；不会忘记堂堂国家主席的遗体蓬头垢面、光着脚板，连个名字都没有就被匆匆火化；也不会忘记张志新、遇罗克

们仅仅因为政治观点不同就成为死囚。社会上的所有这些迷乱荒唐，在“6377 特种部队”都可以找到影子。

“在农场里，只要哪天广播电台播出一段毛主席的最新指示，部队就要求学生连连夜到周围的村子里把在睡梦中的农民唤起，向大家报喜、宣讲。村里连电灯都没有，可怜睡眠惺忪的农民能听懂什么呢？”（朱听如《在 6377 前后的日子》）

“在农场，除了高强度的体力劳动，就是漫漫无尽的政治思想学习……当时的学习，往往要自己批判自己，找出一两段主席语录，将一些鸡毛蒜皮的所谓‘活思想’暴露一下，上纲上线，批它个狗血喷头，就算是觉悟得到提高，学习有了进步和成效。”（杨德兴《部队农场生活杂忆》）

“有一个班的班长，在这样的繁重劳动之后，大多数人鼾声如雷，她还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学《毛选》，第二天劳动劲头还特别大。连里大肆宣传，要大家向她学习。有的同学同我议论，认为这是弄虚作假，实在没有提倡的必要。不知为什么，我们在私下议论的问题都传到部队领导那里。由此领导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，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，是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。于是，对我进行了公开或非公开的批判、施压、孤立、打击。”（董立坤《真理，正义，人类的良知是永远不灭的火光》）

鲍寿柏的文章，讲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。他刚到农场不久，就被农场领导找去，原来是一封邮局革委会寄来的检举信，揭发他竟敢把邮票贴在毛主席语录上，遮挡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芒！这可是个足以置人死地的罪名，多少人曾因喊错了一句口号、写错了一个标语而身陷囹圄甚至人头落地。幸亏农场领导还算开明，教训一通了事，但邮局那帮造反派神经质的“本能反应”和猎犬般的嗅觉，却让人不寒而栗。

在“文革”时期，人性是绝对的贬义词，人们不能谈亲情、温情，更不能谈爱情。一进农场，部队干部就宣布了“三不准”：一不准回家探亲，

二不准谈恋爱，三不准结婚。如果说后两个“不准”还勉强可以成立，头一个“不准”就是不近人情的混账逻辑了。

正是这个混账逻辑，在“6377”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悲剧。

一位同学是江苏南通人，母亲病危，父亲打电报叫儿子回家，连部压下电报，封锁消息。母亲苦等几天，也没把儿子盼来，真正是“死不瞑目”。母亲去世的第三天，他才回到家中，家人都不谅解，他无端背负了读书忘本的恶名。另一位年纪较大、已经成家的同学，儿子在家被拖拉机撞伤了，连队没同意他回去，母亲因此生病了，还是不让回去，最后爱人因此犯了病，他终于忍无可忍，自行打道回府。更惨的是一位叫印根明的同学，母亲病重，打来电报，部队领导照例怀疑是“谎报军情”未予理睬。第二次又来电报，他当面向营长求情，也遭拒绝。第三封电报传来噩耗，他终于得以回家，竟得知是他的迟迟不归，让母亲绝望自杀。这是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难以想象的人间惨剧。他心中愤懑，回部队后难免有怨言，谁知，这又被批为“小资产阶级思想，不能正确对待个人利益和革命需要，对部队再教育有抵触情绪”，并作为“阶级斗争新动向”组织全连批判。尊长爱幼，孝敬父母，是中国的传统美德，何况母亲生了重病，怎么就不能回家看看？此事给印根明造成的终身痛苦，至今也难以平复。

“文革”是一场浩劫，是“乱了自己，惊呆世界”的全面失序。农场里存在的专断、冷漠、蛮横、瞎折腾等种种弊端，其实也正是整个“文革”极“左”、偏执、变态的缩影。

拉练，是军训的重要内容之一，昼夜兼程，急行军150里，学生走得一点不比战士差，但正式拉练前，一夜三五次的“小拉练”，就是故意整人。特别是不少女生，特殊生理状况下刚躺下又被赶起，其狼狈境况可以想见，她们成了改造者恶作剧的牺牲品。

团部放露天电影，是学生们仅有的娱乐。但这娱乐不过是放那些老掉

牙的“老三片”——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平原游击队》和八个样板戏。一旦放电影，学生分队必须打着背包跑步到放映地。有时候连放两部片子，回到营地已是凌晨两三点钟，还要组织讨论一小时，第二天六点半起床，七点下地干活，“一夜只能睡两小时”。

不少同学记得，到农场不久，就接到命令，到颍河参加游泳训练。学游泳是好事，但不管有无基础，几天之内必须学会，最后还得参加连续游3000米（或10000米）的考核，这种训练方法让人瞠目结舌！一些从来没下过水的同学，被煮饺子似的扔进河里，喝水也好，抽筋也好，连续四五个小时不许上岸。虽然最后没有出人命，但如此野蛮训练，给这些年轻心灵留下了浓重的阴影。

冬天修水利挖河泥，无论男女，都要踩着没脚踝的冰水，一天干十几个钟头，一些女生因此落下了病根。1971年春节，贫下中农都让休息几天，放鞭炮过年，学生分队却要过“革命化春节”，不放假，连日挖沟。

夏秋“双抢（抢收抢种）”，是“再教育”超限试验的范本。农场明明有收割机，却不让学生分队使用。管理人员甚至把学生当“劳改犯”驱使，完全不顾有些人在学校就是“全休”病号，有人患风湿性心肌炎、患肺结核、患腰疾、患血吸虫病。在“一律不准请假”的律令下，大部队连续作战，有时24小时连轴转，严重摧残了学生的健康。

据一位同学回忆，他因心肌炎下不了床，有一天没有参加劳动，军人排长竟把一个班的学生叫到他的床前进行大批判，后来找来军医检查，才准假休息。另一位同学回忆，他们连队许多人生病，指导员拿着温度计给病号们测量体温，低于39度的不算病，必须干活，超过39度的也不许休息，要集中学《毛选》。他回忆，病号们宁愿下地干活，也不愿学《毛选》。还有位同学统计，每个“双抢”季，都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学生病倒，除了劳动强度太大，跟淮北当地生活环境差，蚊虫猖獗，“双疾”（疟

疾、痢疾）流行也有很大关系。

这本书，无疑是“臭老九”们对“文革”经历的回顾和反思。40年后的回顾和反思，已经少见年轻人的激愤和冲动，而多了老者的冷静、理性与平和，正同摄影中的黑白照片，没有浓烈的色彩，全靠画面上巨大的黑白反差，就足以发人深省。我想，如果将来真有那么一天，巴金老人关于建立“文革”博物馆的提议得以实现，这本书里提到的案例，完全有资格进入馆藏。

更加难能可贵的是，这本专门记述知识分子接受“再教育”的书，展示的不仅仅是磨难和痛苦，还有令人动容的真、善、美，闪光的理性和智慧，以及一代知识分子面对逆境勇敢捍卫自身尊严的无畏精神。

请读者注意书中的几个著名“事件”，其实这正是人与制度之间激烈冲突的迸发。毕竟，凡是有点正义感的人，都不能无视公理被公然践踏、良善被野蛮摧残。

“七班事件”，源于印根明母亲的非正常死亡，同学们不满部队领导“不准请假”的决定，公开同情和支持印根明，这引起刚愎自用的领导们的弹压。他们上纲上线，把正常的意见反馈，上升为“阶级斗争新动向”，并力图利用这个事件，把学生们很克制的反应彻底摧毁。这引起了同学们更激烈的反弹。在长达数旬的抗争中，学生们团结一致，巧妙地采取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”的策略，用领导漠视“贫下中农学生”的合理要求，导致“贫下中农母亲”非正常死亡的恶果，指斥部队领导“缺乏阶级感情”，“马列主义对外不对内”，反驳了“阶级斗争新动向”的谬论。这种反抗虽然是有限的，但也是有理有利有节的，它的影响超出了“七班”，扩大到了排、连。这次事件以整人阴谋黯然收场告终。

更为悲壮的是“李明事件”。李明是北大学生，他熟悉军队的制度和管理，他认为学生营这些折磨人的“高招”，都是连营干部的“发明”，

目的是创“业绩”，以便提职晋升。他说只要制造一些事故，就能让他们的美梦破灭。于是，他先是拒绝参加劳动，被当作重点批判对象实行监管，后来决定“以身试法”当“逃兵”。部队派人把他押回，他半路再次脱逃，此事惊动了省军区，军区经过调查，认为学生营的做法简单粗暴，学生营部因此挨了批评。此后他们果然有所收敛。

我们曾经年轻，在那充满苦涩和伤感的日子里，青春的活力曾为我们枯燥的生活注入脉脉温情。不少文章回顾了在那么艰困的条件下，同学们是怎么样的相互关怀、支持与帮助；回顾了在绝对禁欲的环境中，爱情是如何悄悄孕育和萌生；还有那些无师自通的自我保护和生存技巧，偶遇机会就即刻喷薄的运动天赋、艺术才情……读来都让人百感丛生。在农场的日子里，我曾数次被抽调到师部工作，还承担过为样板戏画布景的任务，但直到看了几位战友的回忆文章，我才第一次了解 82、84 分队排演样板戏《智取威虎山》《红灯记》的详细过程。我们这支四百人的队伍，接到演样板戏的命令之后，居然很快选出了合格的少剑波、杨子荣、座山雕、李铁梅、李奶奶，挑出了称职的导演、美工、乐队，还能做到在极短时间内上演，达到令周边军民惊叹的准专业水平，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啊！缅怀这些往事，谁能不感慨：在这三届毕业生中，有多少藏龙，多少卧虎，如果不是这场浩劫，他们能为祖国和人民创造出什么样的辉煌业绩？！

离开农场的这四十多年时间里，国家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们为祖国取得的每一个进步而欢欣鼓舞，也为现实存在的众多严峻的经济社会问题，如贫富差距拉大、社会分配不公、贪污腐败、道德滑坡、诚信缺失、资源浪费、环境污染，以及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而忧心忡忡。今天，我们在这里还原历史，揭示疮疤，并不是要算旧账，恰恰是为了更好地面对当下，面对未来。

“6377 农场”其实就是一只很好的小白鼠，通过对它的剖析，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，更好地看清那场亘古未有、不可思议、荒诞之极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真面目。

“革命”一词，典出《周易·革卦·彖传》，“天地革而四时成，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”，说的是公元前商王汤讨伐夏桀，周武王讨伐商纣，都是顺应天意，符合民心的事情。这里的“革”即改变，“命”即天命。古代的君主叫作“天子”，是受命于“天”的，所以改朝易姓，把天赋予的权力从这个君王转移到另一个君王，是改变“天命”的行为，这是神权政治观对“革命”的解释。古希腊时代，一些哲学家也把“革命”看成是推动社会变革，实现正义和恢复秩序的历史过程。从古至今，人们说到“革命”，大多把它和“暴力”“正义”联系在一起——“革命”就是用暴力手段实现公平正义。

现代意义的“革命”，是从日语来的，经过改造、演进，已少了暴力的因素，多了变革的含义。比如，日本人把明治维新也称为“革命”，而明治维新基本是政治变革，而非暴力革命。

无论站在东方或西方的立场，用古意或今意解释，“文革”都和“革命”沾不上边，原因很简单，这是一场“给党、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”（见前引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）。

我们必须承认，中国的封建主义、蒙昧主义传统根深蒂固，我们曾长期陷入蒙昧主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。史无前例的“文革”固然是蒙昧主义的样板，但在此之前，我们做过的蠢事还少吗？“反右”的“阳谋”，把 55 万知识精英打成异类，发配到北大荒、夹边沟那样的荒蛮之地一去 20 年；紧接着是“三面红旗”——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，大炼钢铁、砍树烧山、吃大锅饭，种万亩田，最后“三分天灾，七分人祸”，造成饿毙千百万人的惨剧；一年后，彭老总为民请命，在翔实的调研之后，说了

真话，却马上被打成莫须有的“反党集团”和“军事俱乐部”，革职流放。

蒙昧主义是万恶之源。蒙昧主义非彻底打倒不可。

揽镜可正衣冠，读史可知兴替。这就是我们编辑这本书的初衷。我们愿以自己的微薄之力，拂去这面镜鉴上的浮尘，让它映照灿烂的时代辉煌。

“文革”十年，我们这代人一生最美好的时光，已在西西弗斯式的“无用功”中虚掷了。我们唯望这样的荒唐不再发生，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！

（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65 级学生，6377 部队学生营 81 分队成员，连队重组后编入 82 分队）

001	朱旭铭	偏航的历史
036	鲍寿柏	日出
050	张宝林	农场琐忆
072	米丘兰	40 年后再回首
080	冯就宜	“大学校”的 365 天
095	黄淑珍	艰难识世情
106	吴敬倚	6377 军垦农场那些事
111	蔡国有	在被“改造”的日子里
123	许清廉	农场轶事
130	傅耀良	回首在插花庙农场那一年
150	徐振源	重访阜阳忆当年
158	章 青	那年 那月 那地 那人
164	董立坤	真理，正义，人类的良知是永远不灭的火光
176	王芸苏	和自己约会 与往事干杯
188	李永贤	锻炼 磨炼 磨难
197	杨德兴	部队农场生活杂忆